

文献与社会

谢 灼 华

本文以文献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对文献的影响和作用为题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探讨了人类只有进入文明社会后,才能产生文献的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分析环境、国家、公众、意识等社会因素对文献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说明社会对文献发展的制约关系和文献对社会条件的依赖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文献与社会关系中的若干矛盾现象,以及相应的调整措施。

文献,作为记录知识的载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显示了巨大的功能,它既是历史文化的记录,也是社会交流的重要媒介、信息传播的桥梁。因此,所谓“信息社会”的呼喊,一定意义上是文献数量增大、文献需求多样、文献利用广泛、文献作用显著的体现。所以,探讨文献与社会关系中诸如社会发展与文献、社会因素如何推动与制约文献、文献如何作用与社会等问题,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

从根本意义上说,文献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年代里,人类只有进入到文明时期,才能产生文献。文献进入社会以后,则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文化的积累,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之所以能够积累,正是因为有一种记录方式把文化记录下来,流传开去,形成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献,正是一种记录文化的方式和手段。所以,人们称那一部分已经物化了的文化——文献,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丰富的文化资源。

被恩格斯誉为“伟大进步的奠基者”的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①在分析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时,他认为文明社会是“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②恩格斯在引述上举文化发展的阶段的论述后,在说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时说:“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③

摩尔根所划分的文化发展阶段是符合科学的,恩格斯在评论摩尔根著作的影响时说“他给

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⑧这里,我们考察一下摩尔根关于文字、文字记载的论述,对于理解社会发展与文献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这个论断是准确的。摩尔根论述近代文明和古代文明进步的关系时,反复申明近代文明进步都是此前的社会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大量地吸收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他说到文字时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⑨摩尔根认为荷马诗篇是“作为希腊人进入文明的标志。”《伊利亚特》“有关人类进步过程的记载是现存材料中最古老、最详细的。”^⑩他对于文字记载的功用,除了用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说法外,还对古代社会存留文献所表现出来“在智力和心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加以赞扬。当然,这方面,恩格斯还补充了一些例证,并对社会发展与文献的问题作了更为明确的叙述,对于我们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文献与社会发展诸多联系中,我们应当认识到: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发展中得以不断进步和提高的,也就是说,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着人类。

人类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经验,又从社会改革和对自然斗争中提高认识的能力,逐步形成系统的知识和加工整理各种社会意识。

由于记录社会意识和积累知识,当然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交流和传播,人类在探求一种记载手段,文字应用于文献记载,即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

文献记载的出现,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还应看成是一种社会条件的出现。首先,这样一种文明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丰富,劳动阶级中除了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也分离出一批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他们既是艺术产品的生产者,也是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时,他们掌握文字记载的工具、材料,甚至垄断了文化,可以进行多样的理论、艺术、史事和自然现象等社会存在的物化工作,即从事文献生产、加工、保存、利用的全过程,文献出现成为可能。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表现出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融。社会必须提供生产的剩余产品,人类可以赖于此而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工作,这就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文献产生的条件。与此同时,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有利于文献活动的开展。文献活动的普及和深化,直接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

二

在文献与社会的关系中,有哪些方面可以作为文献发展的社会主要条件提出来讨论的呢?

(一)环境

环境是人类发展无止境的、经常的、“永久”的源泉,它既是人类存在以前就有的自然环境,又是由于人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人为环境。人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必然使自己得到改造,人本身的改造,人的适应环境,以及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改造环境的活动,所有这些过程,称之为文化过程。文化发展是如此,文献的发展也是如此。

首先,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都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它在每个人、每一代人面前都以新的形式出现,因而,总的要求对它的变化作出适应,这些必然作用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行为。

文献发展中生产文献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文献的传播与交流,也必须在一定的环境

下进行。

任何社会,生产文献的基本条件是载体,因为只有载体,才能书写、抄传和扩散。不同时代的载体是在一定社会的环境下提供的。不同环境下的载体,形成了载体的物质、数量和品种,当然也决定了载体的使用,构成了当时文献生产的规模、水平。古代巴比伦的文献载体是泥板,这是因为古代巴比伦处于两河流域,最便于选材的是泥土。运用泥土做成泥板,自然在泥板上刻写的是楔形文字,文字笔画始轻终重,明显是用力于泥板上形成的结构,这种载体虽然达到平展便于书写,但体积大而笨重必然使这种载体不便于携带,只得保存于官家和寺院。

古代埃及的文献载体是纸草纸。古埃及处于尼罗河流域,尼罗河两岸滋长着大片象芦苇样的野生植物,人们把它们采集下来,加以剥制、编连和压平,就成了一种面积较长而平整的书写材料,故称纸草纸。埃及文字书写则平行舒展,受制于这种载体的材料结构。这种载体比之泥板轻便,易于制作,但对长久保存是不利的。

古代中国在商周以至战国,文献载体可能为“各取所需”,选材上用龟甲、玉石、金属器物、以至竹木薄片,都用于文献生产。这不仅因为当时神州大地,尚无一种材料遍及各地,可供选择使用,而且上述载体就地取材,方便易得。中国汉字以线形描画,分散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载体。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献传播与交流,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南宋以后,雕版印刷中心有三: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因而形成三大版本系统,称杭本、闽本、蜀本。我们考察一下较长历史时期的三大出版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就可看出环境对文献发展的深刻影响。

文化环境。南宋临安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官吏、士大夫集中活动之地,故可称南宋文化中心。社会需要对文献生产提出了广泛的需求,也就是说书籍需要量大,文献品种多样,因而文献生产集中、多样。由于竞争,更使文献质量不断提高。福建地处东南,南宋文化发达区域的江浙、江西、安徽都与福建交会,福建建阳处于闽北,过岭可到江西以至浙江,保证这个文化区域文化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当地印刷事业的兴起与发达。

工艺技术环境。它促成了三个印刷中心的发展。中国纸、笔、墨工艺技术的发展,除了技术工匠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提供。中国是造纸术的策源地,但宋以前,纸的原料比较狭窄,多为麻类。宋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对纸的需要量增大。江南造纸选用地产树皮(如桑树、楮树)、竹子,达到了量大与价廉的要求。南方纸张和墨的生产以浙、皖、闽最为发达。因为浙、皖、闽众多竹木之材,为纸张生产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料。文化环境的南移,浙、皖、闽诸地则为纸、笔、墨等文化用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所以浙本、闽本的独特工艺的形成,应该说是在江南诸省广泛的工艺技术环境的背景下完成的。

交通贸易环境。文献产品总是具有二重性,即既有精神产品的特征,又具有物质产品的特征。所以,文献产品往往具有可以交换的价值。文献生产以后,没有交换和流通,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所以,书籍作为商品,按最早记载,从汉代就有书市性质的交换和流通。到了南宋,处于南方各省的交流网络,特别是江河舟楫之利,临安府(杭州)、平江府(苏州)、建康府(南京)成为重要的出版物集散地。到了明代,同样依靠江河水运之利,政治中心的北京与这几个地区更为全国的书市:“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闽閩也、临安也”“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所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越中刻本自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中。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甚多。钜帙叠出,咸蔡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⑦

(二)国家

社会文献的发展,重要条件之一是国家的存在。国家是一定阶级手中的工具,在任何社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定政治集团的利益和统治力量的体现,都积极地促进有利于它的利益的文化的巩固与发展,并且有力地摧毁和消灭敌对势力的文化。这一方面,可以表现为推行一种思想统治,推广一种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则集中建立一种有利本阶级利益的文化体系,其中最明显的是建立文献体系。

国家作用于文献发展上至少可以从下面几方面体现出来:

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文献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出版部门、文献信息中心等)。

国家拥有文献工作者队伍。

国家拥有培养与训练干部的学校。

国家通过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拨付、行动管理手段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图使它的文化价值、思想原则、道德规范在全社会都必须遵循实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国家决定着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监督社会的舆论,推行一种文化风尚,在某种条件下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文献生产、交流、传播和使用的进行,一句话,控制着文献的发展。

国家,一般由它的政府执行对文献的控制。大致上,什么时候运用牧师的面孔弘扬和发展文献,什么时候厉行刽子手的职能控制和摧毁文献,或者是两手并用,都是根据政府所处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发展势态而选择的。

对于一个国家通过政府控制文献生产与流通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事实。

《四库全书》编纂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乾隆怀着“稽古右文”的目的,经过广泛的收罗徵集、甄别鉴定、汇总编纂,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成的《四库全书》,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进而有利于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学术的繁荣,存留的《四库全书》,为我们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献发展史上的大事,对世界文献发展史也有重要的意义。

清乾隆修《四库全书》一事,可见政府对文献发展的影响程度。首先,清庭推行一种统一舆论的制度即用“寓禁于征”的手段,进行了全国性的征缴图书活动。当时上到王公贵戚,下到士夫百姓都在征缴范围内选送书籍、汇集朝廷。运用各种力量查抄“违碍悖逆”之书,即利用这次各种图书荟萃之机,别择校勘“备为甄择”,排斥不利于封建统治思想、道德和制度的书籍。据统计,“在长达十九年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⑧其次,组成四库全书馆,具体负责《全书》编选、整理、写定、入藏诸事。《全书》收入书籍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第三,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选择、阅读、评判、利用价值各方面提出了“钦定”的意见。第四,为《四库全书》建立七阁,提供书籍保存、传播、利用的条件。四库全书研究者黄爱平对此书编纂作了一个基本用时、用人、用财的统计,“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至五十二年四月续缮三分全书告成,在长达十四的时间里,清朝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基本完成了七分《四库全书》的纂修和缮校工作。以参加人数计,历任誊录人员达三千八百四十一人(包括《四库全书荟要》誊录二百名在内),再加上数百名纂修、分校、提调、收掌、总裁、总纂、总阅等有关工作人员,总数不下四千二百余人;以全书册数计,每分约为三万六千册,七分总共二十五万二千余册,以全书页数计,文津阁全书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页,七分合计一千六百零三万余页。”^⑨

从以上《四库全书》编纂的全过程看,国家(即清庭)干预文献发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建

立体系,二是摧毁对立面。《四库全书》体现了保存、弘扬文化的一面,保存下来众多上古至清代重要文化典籍,提供了人们阅读、利用的基本文献,江南三阁的藏书就是可以利用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对抗,确实起到了一种平抑安抚民族反抗意识的效果。另一方面,《四库全书》集中了摧毁文化的诸种手段,又是毁灭文化的措施。通过征集、选择、判断以至直接对书籍加以抽毁、删削、纠正,伴之以连续性的文字狱,具有强烈指导意义的《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摧毁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献记载,重新确立的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与文献记录体系,都是牧师和刽子手职能交替使用的结果,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套利于封建统治的封建文化体系。

(三)公众

文献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是使社会成员获得精神财富,因而促使社会成员生产、利用和保存文献,这样,文献就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没有掌握文献,不参与文献的生产与利用活动,他们自然不会对文献提出要求,文献脱离了社会需要,脱离了公众的直接干预,它的发展自然是一句空话。当然,如果社会文献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公众对享用人类社会财富,包括各种文献的利用无法进行,新的文献自然无法更替旧的文献,文献发展也会逐步走向没落。

这里所谓文献发展中的公众,就是关心、支持并直接参与文献生产、整理、利用的人。历史上可以表现为一支学术工作者队伍,现在则包括一部分文献生产者和一部分文献消费者。这些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参与文献活动,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社会阶级或集团的成员,但他们对文献活动的产生与发展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奴隶社会时期,巫,由于参与宗教活动并记录文献,就是文献的直接生产者、传播者。史官是一种文化职业,担负起草文件、充任顾问、保存档案文书、提供查验等工作任务,所以,他们是当时文献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和保存者。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史官专司记录、编纂史籍,以后兼著作事务,仍然是文献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当然,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公文档案的繁富,文化典籍的日渐充实,参与文献活动的人不断增多。但应该看到,作为阶级社会中文献活动参与者总是有一定局限的。

随着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文献的消费者也不断扩大。科举制度的实行,必然带来文献利用普及。著书立说和教育的发展,必然要求阅读的广博与专深。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建立和交通的发达,适应市民阶层阅读、欣赏的通俗读物应运而生。这些,都可视为文献消费的变化。而且应该看到,这种变化直接影响文献的生产、整理、传播与交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个读者群的文献利用急激变化,都应视为社会公众影响文献的例证。

(四)意识

由于社会成员对文献活动的参与程度,决定着文献的盛衰,并且总是表现出一种思想倾向。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的影响,文献总会有一部分是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当然,部分文献并不一定具有某种思想倾向,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文献。

社会成员总是划分成不同的层次,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派别,根据社会成员所依据的社会地位和占有的社会利益,文献的参与者对世界、对人类、对道德理想和情操、对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想的反响不同,因而文献内容总是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及阶级、政党、国家的意愿和要求,所以,我们说文献的思想倾向是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声明新闻、出版以至书刊文献的思想性,这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历史事实,由于不同社会集团和阶级的成员,他们在文献行政管理、生产、整理、利用活动中,分别站在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立场上,对各种文献作出不同

同的评价与判断,总的表现出来对文献记录的真实性、认识的准确性、评价的客观性都不同。“官书”中的“钦定”、“御纂”、“敕编”,固然分明地标出某种文献的生产者,使用范围,权威程度,更说明了文献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和政治意图。而就是一些文献的书写格式、字体、避讳等,则说明了某一时期文献生产、利用中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只能从当时的思想意识影响上找到解释。

长期以来,有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如用“封资修”说明某一种文献,其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官书”,是官方组织编纂的,自然会浓厚地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是,官书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其中有封建性的糟粕,也会有民族性精华的存在。文化内涵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文献实在的含义,必须经过充分的分析与判断,任何简单的处置,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失误。

这里还必须提出一个社会文化财富的问题,长期的人类社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譬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成就,公共道德和准则,文明礼貌与社会交往语言,都应视为文化财富。这里有一个谁掌握它的问题,运用什么政策去发展,以及发展它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但是,对这些文化财富的利用,对待这些文化财富的文献,它的保存、整理和利用,一般是不应带有阶级偏见而应兼收并蓄的。

三

文献发展的长河,总是表现出于迴曲折,百转千迴的局面。社会与文献关系中是适应又不适应、利用又不利用、控制又不控制互相交错组合,形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象。

作为社会成员的读者,对文献需求或是高深,或是专门,或是粗劣,或是通俗,应该说总是一种无限的文献消费。然而,社会的文献编辑、出版、发行所提供的文献数量与品种则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一定流向、规格与等级的。这样,就出现了我们常看到的现象,读者需要的文献不能满足,暂时不能供应,甚至奇缺待补,所谓著书难、买书难的呼声时常出现。但是另一方面,无用的,暂时不需要的,脱离读者需要的文献充斥市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出书难、卖书难,总的是供求关系上的不适应、不协调。解决这些矛盾,当然主要是供的一方,即编辑、出版、发行文献部门的工作改进与提高。目前,一些国家的出版发行部门,在对市场调查予以足够重视的同时,特别注意运用集团、组织的力量,进行读者的阅读倾向的引导,同时,加强指导性计划的调节,并且大力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如文献信息部门的普遍建立,使广大公众享用信息资源和充分利用信息成果。此外,加强出版、发行部门运行机制的管理。应该说文献供求、适应只是暂时的,文献供求不适应是经常的,一个问题解决总是促进了文献的进步与发展。

作为社会文献量总是逐步增多,不断积累的,但是读者对文献的利用往往是专门的、局部的。文献生产、加工、保藏单位的总目的是提供读者利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文献生产部门出版的文献,可能表现出一部分是畅销的、社会效益显著的、高质量的产品,有一部分可能就读者少、利用率低。这里还包括文献保藏单位收藏品种数量的增加和扩大,并不一定是读者的增加,书刊利用率的提高,这种现象是始终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文献出版部门的两种效益的提法,文献保藏部门的“以书找人,以人找书”的做法,就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办法。目前,正在出现的文献利用网络,资源共享计划;加强书籍出版的选题规划与监督,进行协作出版;图书发行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书刊宣传与文献报导体系的加强;进行文献流量、出版趋势、核心期刊、优秀图书的评奖等等,应该说,都有利于读者有目的地、更方便地利用文献,并朝着更完善的文献利

用体系而努力。

作为社会集团、政党和国家机构,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作出鼓励、支持、宣扬某种文献,或制订出限制、查禁某种文献的措施。然而,作为社会成员的读者,总是表现出二种心态,或表示拥护和支持某种文献,或是以一种反抗的行为对待某种文献的查禁与焚毁。社会上有时产生一种怪圈,某种文献屡禁不止,这种现象是很值得重视的。毫不讳言,无产阶级的政党或国家机构,对于图书文献的选择与掌握是符合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文献流传的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文献交流与传播应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因此,加强文献政策的宣传,充分地提供优秀的、健康的各种文献,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并且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保证社会主义文献事业的发展,及时准确地抵制不利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图书报刊,这样,文献需求上的猎奇现象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注 释:

- ①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 页。
- ②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1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
- ⑤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0 页。
- ⑥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0 页。
- ⑦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55 页。
- ⑧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 页。
- ⑨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7~158 页。

(责任编辑 江 平)